

中国的 人口与经济发展

ZHONGGUO DE RENKOU YU
JINGJIFAZHAN

李仲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的 人口与经济发展

ZHONGGUO DE RENKOU YU
JINGJIFAZHAN

李仲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人口与经济发展/李仲生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7

ISBN 7-301-07575-8

I. 中… II. 李… III. 人口-关系-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C924.24 ②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0833 号

书 名: 中国的人口与经济发展

著作责任者: 李仲生 著

责任编辑: 杨小黎 熊少萍

标准书号: ISBN 7-301-07575-8/F·089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em@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51736661

印 刷 者: 三河新世纪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8.5 印张 303 千字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教材供应部门联系。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李仲生,男,1951年生于北京。日本千叶大学经济学博士,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学博士后。现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日本国际亚洲文化学会亚洲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学研究科特约研究员。长期从事新兴边缘学科人口经济学研究,代表专著《从人口经济学角度分析中国的人口变动》在2002年荣获首届日本“华人学术奖”。主要论文有《日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及其变化》等30余篇,总研究成果达150多万字。其留学日本的特殊经历及奋斗精神自大型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之我的太阳》在全国播出后,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数百家中外媒体进行过报道。2001年成为北京青年报跟踪报道的年度新闻人物,2002年被中国人生科学学会推荐为“中国人生科学”讲演团副团长。传略和学术贡献被《世界名人录》等三十余部辞书收集入典。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为“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和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出版资助的研究成果,以中国的人口与经济发展为题进行了一系列论说及实证分析。为了接近这个基本课题,首先从总论的视野论述建国以来中国人口变动的模式、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波动过程,并就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了多重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经济开放与人口流动、经济体制改革与人口控制政策,以及将来的经济发展的趋势与人口因素等人口经济问题。就方法论而言,本书在分析中国的人口经济问题上采用了从微观到宏观、从短期到长期、从静态到动态、从统计的实证分析到计量的经济分析。

本书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力求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人口经济领域的某些空白,促进了人口经济方面的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性。

前 言

建国 50 余年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特别是自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目前经济规模总量已达到世界第六位。与此同时,人口动态由高出生低死亡的状态转变为低出生低死亡的状态,但人口增长速度依然较快,2000 年已接近 13 亿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人口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现在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最大问题,它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目。

在中国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过程中,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经济问题研究,以及中国人口变动、人口流动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专著相继问世,对于本书都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然而从人口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综合问题研究,在国内外研究动态中还是比较少见的,其重要原因是人口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作为一个体系化的学科直到 1978 年的赫尔辛基国际人口学会的学术会议上才被正式认可。随后,中外学者分别对中国的人口变动和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但基本上没有从人口经济学视角来探讨中国的人口经济问题。近年来,中国在人口经济研究上有一些进展,但对中国人口和经济变动的相关研究仍然较为沉寂。本书则打破传统的研究手法,主要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来阐述中国的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变动的经济效果以及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综合关系,因而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本书以中国的人口变动和经济发展的综合关系作为基本课题进行了一系列论说及实证分析。为了接近这个基本课题,首先从总论的视野论述

建国以来中国人口变动的模式、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波动过程、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人口因素,并就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其次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概述生育率转变及其经济因素分析、死亡率转变和生命表的推算及其转变的经济因素分析,考察了多重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人口增长与生活水平、经济开放与人口流动、经济转型与劳动力就业、农村经济发展与剩余劳动力、经济体制改革与人口控制政策等人口经济问题,探讨了其历史推移、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最后通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笔者等的预测,展望未来的人口动态和经济变动、人口增长和粮食需求、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发展的趋势与人口因素等人口经济问题。

就方法论而言,本书在分析中国的人口经济问题上采用了从微观到宏观,从短期到长期,从静态到动态,从统计的实证分析到计量的经济分析。这种研究方法在西方人口经济学中是常见的。就其方法论而言,不但对若干人口经济问题进行假说的分析和理论的分析,而且还重视统计的、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本书阐述了中国的人口与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并利用人口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中国的人口经济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案例比较分析。另外,某些章节的结构力求新颖,如在第三章死亡率转变的经济因素和生命表分析中,运用死亡率转变的经济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的手法对死亡率转变的经济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

本书力求创新,设想了若干假说模式进行可行性分析。——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未来人口预测是本研究课题的难点之一,相对于中国长期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而言,它打破了传统的高位预测、中位预测、低位预测的国际惯用方法,在采用 A 预测法和 B 预测法的基础上,运用了独特的 C 预测法,以“二子”政策的预想作为前提,分别设定城乡和农村的总和出生率的假定值,然后通过地区简略生命表的一系列基本函数推算出死亡概率(${}_nq_x$)以及出生性别比的假定,根据要素法分别预测 2000—2050 年的城市、乡镇和农村的人口和总人口的发展趋势,进行假说模式的分析和数量

分析——并根据不同的人口发展模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本书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人口经济领域的某些空白,可以促进人口经济方面的研究,从理论到实践,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性。

本书作为“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的资助和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的出版资助,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和鹏搏工作室的支持,在此特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李仲生

2004年7月20日于北京

目 录

1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1)
1.1 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转变的模式	(1)
1.2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4)
1.3 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	(13)
1.4 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7)
2 生育率及其转变的经济因素	(32)
2.1 生育水平的变化	(32)
2.2 生育模式的变化	(41)
2.3 教育程度、职业及居住地区的差别生育率	(42)
2.4 影响生育率转变的生物因素	(46)
2.5 影响生育率转变的经济因素	(48)
小结	(62)
3 死亡率、生命表及其转变的经济因素	(65)
3.1 死亡水平的变化	(65)
3.2 生命表的推算	(70)
3.3 从生命表来观察死亡水平	(81)
3.4 死因结构的变化	(87)
3.5 死亡率转变的经济因素	(90)
小结	(93)
4 多元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	(95)
4.1 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	(95)
4.2 价格多元化与价格管理体制改革	(101)
4.3 经济结构的多元化	(103)
4.4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	(110)
5 经济开放与人口流动	(121)
5.1 对外经济发展的变化	(121)
5.2 经济开放和经济圈的发展	(129)

5.3	人口流动的发展趋势	(134)
5.4	人口流动的主要类型	(138)
5.5	经济因素的人口流动	(143)
5.6	经济开放与农村城市间人口流动	(146)
6	人口增长与生活水平	(153)
6.1	人口增长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153)
6.2	收入水平的变化	(156)
6.3	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	(162)
6.4	生活水平的国际比较	(170)
6.5	教育体制和教育水平	(173)
7	劳动人口就业与经济转型	(177)
7.1	劳动就业人口的变化	(177)
7.2	劳动力参与率	(180)
7.3	就业制度的变化	(183)
7.4	经济转型与失业	(191)
8	农村改革、发展与剩余劳动力	(197)
8.1	改革前的农村体制与农村经济发展	(197)
8.2	乡镇企业的发展	(202)
8.3	农村的经济发展、体制改革与就业结构	(208)
8.4	乡镇企业的就业与农村剩余劳动力	(215)
8.5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218)
9	经济体制改革与人口控制	(221)
9.1	计划经济体制的变革与人口政策	(221)
9.2	经济体制的改革与人口控制政策	(226)
9.3	人口控制的人口效果	(238)
9.4	人口控制的经济效益	(241)
9.5	深化经济改革和人口体制改革	(244)
10	将来的人口与经济发展	(251)
10.1	将来人口发展的趋势	(251)
10.2	人口增加与粮食供求	(266)
10.3	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	(270)
10.4	将来的经济发展与人口因素	(274)
	参考文献	(283)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人口控制政策的实施,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抑制了人口的快速增长趋势,减轻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口压力,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令人瞩目。在这一章中,将概述 1949 年以后中国人口转变的模式、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动态变化,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并就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

1.1 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转变的模式

1.1.1 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

经济持续发展过程中人口转变^[1](demographic transition)学说是由阿德尔费·兰德里(Adolphe Landry)在 20 世纪初、沃恩·汤普森(Warren Thompson)在 20 世纪 30 年代提出,经过弗兰克·华莱士·诺特斯坦(Frank Wallace Notestein)、查利斯·布莱克(Charles Blacker)以及其他许多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根据西欧发达国家人口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实际资料,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增长类型的转换,进行阶段划分和描述而形成的经验法则。从人口转变理论的发展来看,按照布莱克的“五段式”,并引用哈维·莱本斯坦(Harvey Leibenstein)的模型图,人口转变过程是能够观察到的。

布莱克把人口发展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即高位静止(high stationary)、初期扩张(early expanding)、后期扩张(late expanding)、低位静止(low stationary)和减退(diminishing)。他的人口转变模式可用曲线描述如图 1-1 高位静止(HS)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在高水平上达到均衡,人口增长

处于静止状态；初期扩张(EE)阶段，由于经济发展的某种刺激，死亡率逐渐下降，出生率依然维持在高水平上，于是人口增长率逐渐加速，最终达到最高增长率；后期扩张(LE)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进一步促进，死亡率继续下降，结果接近最低限度，出生率也开始下降，人口增长率扩张后减速，不久人口和经济均处于停滞状态；低位静止(LS)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在低水平上重新达到均衡，随着经济发展的减速，人口增长再次处于静止状态；减退(D)阶段，出生率继续下降并开始低于死亡率水平，人口增长处于绝对减少状态——这一现象只有德国、意大利、俄罗斯、保加利亚以及罗马尼亚等少数欧洲国家出现过，其幅度小，可以忽略。

汤普森和诺特斯坦的模式如图 1-1 的下部所示，较为简单。该模式将人口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它将布莱克的高位静止阶段和初期扩张的前期称为高增长潜在力时期，在该时期出生率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前期扩张的后期和后期扩张的前期称为过渡阶段；将后期扩张的后期和低位静止的前期称为低增长潜在力阶段，此时出生率处于被抑制状态。按照这种人口转变的划分，世界各国的人口发展模式是能够区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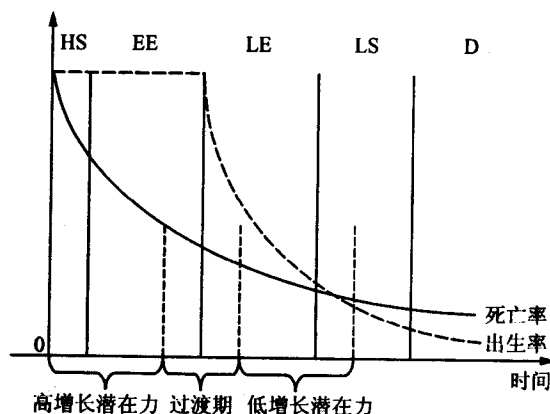


图 1-1 人口转变模式

资料来源：H. Leibenstein, *Economic Backwardness and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1957, p. 156.

从西欧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来看，高位静止(HS)阶段大致包括中世纪及以前的漫长时间，此时人口增长极其缓慢；西欧各国相继发生产业革命之后，由于经济起飞，死亡率开始下降，与此同时，出生率变化不大，仍维持在高水平状态，人口发展模式由传统的高出生高死亡转变为高出生低死

亡,从而形成了人口加速增长的初期扩张(EE)阶段。进入 19 世纪后半期以后,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业化的深入,死亡率继续下降,而这时出生率也开始下降,人口发展模式进一步由高出生低死亡转变为低出生低死亡,大约在 1930 年左右开始进入后期扩张(LE)阶段。

1.1.2 中国的人口转变模式

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按照布莱克的“五段式”模式和汤普森与诺特斯坦的“三段式”模式基本上是可以观察到的,高位静止(HS)阶段大致包括 20 世纪前半期及此前的漫长时期,出生率和死亡率均处于高水平,1949 年出生率和死亡率分别为 36.00‰、20.00‰,处于典型的高出生高死亡的状态,人口增长缓慢。1950 年至 1971 年期间,除了 1959—1961 年由于经济危机引起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波动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医疗技术的进步,死亡率逐渐下降(见图 1-2),人口发展由高出生高死亡转变为高出生低死亡的模式,人口增长迅速加快,从而形成了布莱克模式的初期扩张(EE)阶段。其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上升及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出生率逐渐下降,人口增长速度趋向缓慢,到 2000 年,正处于布莱克模式的后期扩张(LE)阶段或者是汤普森与诺特斯坦模式的低增长潜在阶段。中国人口增长曲线的倾向如图 1-3 所示,处于向右上升的局面。这一局面处于人口转变的后期阶段。

然而,中国人口转变模式,特别是生育率转变模式与西欧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缓慢的增长模式是不同的。从出生率的 30.00‰到 20.00‰的变化来看,能够判断人口转变的一个侧面的进行状况。表 1-1 显示的是世界各国出生率的临界水平开始下降的年份和间隔年数。最先完成人口转变的国家是法国。其后,在 20 世纪 20 年代,瑞士、瑞典、英国、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步法国后尘,其人口转变过程大约 15—40 年。而中国出生率下降的初始期与西欧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大大落后,它的下降过程基本上与日本并驾齐驱,仅仅用了 4 年时间就减至转变的低水平。因可以说,中国人口转变的历程是独特的,这一过程主要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生育的控制效果引起的,从而使其转变过程在极短的时期内就得以实现。

表 1-1 人口转变的一个侧面——出生率的降低速度

国家	30‰	20‰	间隔(年)	国家	30‰	20‰	间隔(年)
法国	1830	1908	78	德 国	1910	1926	16
瑞士	1880	1922	42	意大利	1923	1941	18
瑞典	1884	1921	37	日 本	1950	1955	5
英国	1895	1922	27	新加坡	1966	1974	8
美国	1897	1929	32	中 国	1972	1976	4

资料来源:大渊宽、森冈仁的《经济人口学》和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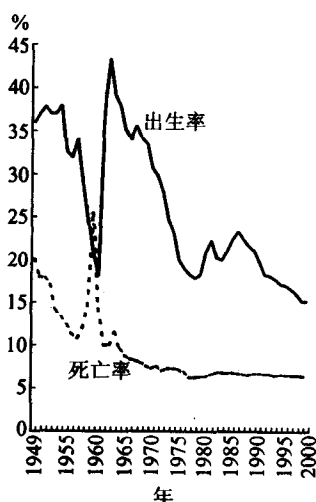


图 1-2 中国人口转变的历程 I

资料来源: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2年版、2001年版资料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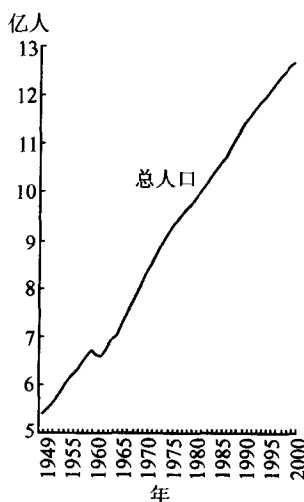


图 1-3 中国人口转变的历程 II

资料来源: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版资料制作。

1.2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从人口经济学(population economics)的角度来看,与人口增长密切相关。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认为,近代经济发展的特征通常与人均产值的持续增长或者与人口的持续上升相结合。中国的近代经济发展从长期的趋势来看,国民生产总值、总人口以及人均产值基本上

持续增长,同时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因素有较大的变动。从各个时期的动态变化来看,在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封建的土地改革,废止外国资本的各种特权,没收官僚资本的铁道、交通运输、银行和工业等,将其国有化。与此同时,限制了私营企业部门的范围和经营,扩大了国营企业部门的规模,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民主改革,使国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有较为显著的提高。此外,国家通过调整工商业,开展城乡物资交流,促进了市场流通。这样随着一系列经济恢复政策的实施,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并初步发展,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工业和农业的主要产品的生产量基本上达到了建国前的最高水平,交通运输业、国内商业、对外贸易等各个领域也有所发展。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19.3%(见表1-2),为后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医疗卫生的改善,人口增加趋势明显加快。由于出生率保持较高水平,而死亡率迅速下降,人口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0%的水平。

表 1-2 各个时期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的比较 (单位:%)

时 期	人 口 年增长率	国民生产 总 值 年增长率	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 年增长率	工 业 总 产 值 年增长率	农 业 总 产 值 年增长率
经 济 恢 复 时 期(1949—1952)	2.0	19.3	17.3	34.8	—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	2.4	7.3	4.9	20.3	3.9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58—1962)	0.8	-0.6	-1.7	5.3	-5.2
经 济 调 整 时 期(1963—1965)	0.8	15.1	12.4	21.6	11.3
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1970)	2.5	7.4	4.4	13.7	3.2
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1971—1975)	2.7	5.9	3.5	9.1	3.2
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1976—1980)	2.2	6.6	5.2	9.9	0.9
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1981—1985)	1.3	10.8	9.3	10.1	8.3
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1986—1990)	1.4	7.9	6.3	9.3	4.2
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1991—1995)	1.6	11.6	10.7	17.7	4.2
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期(1996—2000)	1.2	8.3	7.2	10.3	3.7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的有关资料计算。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换,进行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农业部门除小规模自留地外被集体化,非农业部门则基本上被国有化。与此同时,随着积极的经济振兴政策的实施,制定了比较现实的国民经济计划,国民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增长,国民生产总值为建国初期的2.6倍,年

均增长 7.3%，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4.9%。此外，国家重点进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苏联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方式，建立和扩建电力工业、煤炭工业、石油工业、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以增强国民经济的能源基础和原材料基础；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冶金设备和汽车、拖拉机等机器制造工业，以增强中国生产工具的制造能力；与各项重工业的建设相适应，建设纺织工业和其他轻工业，建设面向农业的中小型工业企业。工业化的推进使工业生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发展，年均增长率达到 20.3% 的水平；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极其迅速。但农业增长则相对较为缓慢，最重要领域的粮食生产仅略有增加。农业生产的停滞主要是因为投资不足。该期人口发展速度明显加快，1953 年至 1957 年，总人口净增 5 857 万人，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年均均为 34.80‰、2.4%，明显超过了经济恢复时期的水平。这个时期由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并没有重视人口控制问题，这样就形成了建国后第一次人口增长的高峰期。

然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中国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它是以钢铁工业为中心制定的高指标来推动的，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不顾效益地把全国主要资源集中于发展钢铁工业，使得国民经济陷入失调和混乱，经济发展经历了困难和后退的局面。由于苏联模式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方式的推进，工业生产在 1958 年至 1959 年期间还较为顺利，虽然其中含有夸大的成分。不久随着工业生产的扩大和生产定额的增加，由于忽视了生产管理方式，工业危机逐渐形成，1961 年至 1962 年期间生产量连续急剧下降。农业减退也很显著。1959 年以后，由于 3 年连续自然灾害的影响，全国总耕地的 60% 受到破坏，农业生产连年负增长。农业的减收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此外，1960 年 7 月中国与前苏联经济断交，前苏联撕毁了大量的协定和契约，停止了重要设备和物资供给，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害。由于这些因素使得经济后退，经济增长率呈负增长趋势，基本建设规模逐渐缩小，消费和储蓄、工业和农业等的比例也显著不平衡。这个时期人口变动由于经济衰退的影响处于不稳定状态。1959—1961 年，由于“大跃进”政策的失败和异常的干旱，出生率大幅度降低，人口增长率也显著下降（见图 1-4）。其结果总人口从 1959 年开始急剧下降，1960 年净减少 1 000 万人，1961 年又净递减 348 万人。

1963 年至 1965 年，中国经济处于调整时期。当时，政府深刻认识到“大跃进”运动导致经济的不平衡和经济衰退，提出经济工作的重点是：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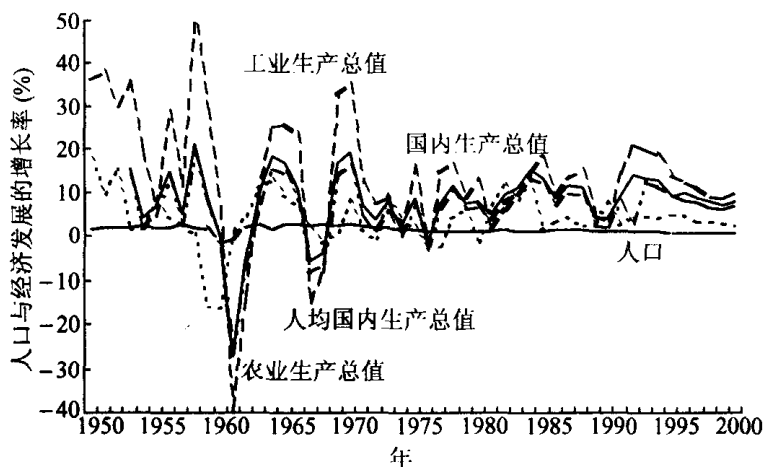


图 1-4 中国的经济、人口及工农业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 年版及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有关资料。

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在经济体制方面配合经济调整采取了压缩工业基本建设规模,大幅度降低工业生产计划指标,精简工业部门职工,停办大批经济效益差的工矿企业等一系列措施。经济调整政策基本上是加强了综合平衡,使各种比例关系逐步趋向协调。此外,试办“托拉斯”,改革企业管理体制,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果,从而使经济全面恢复,大量的经济指标都创造了建国后的最高水平,工业和农业的增长幅度极其显著,年均增长率分别上升到 21.6%、11.3%。工业的恢复也使得各种工业部门发生了巨大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是石油工业、化学工业的急剧发展,其生产总额大约是 1957 年的 5 倍。电子工业、精密机床制造、精密仪器制造、原子能以及有机合成等一些新型工业部门也得到发展。农业的迅速恢复则主要是投资比重增加的效果。另外,化学肥料使用量的增加和灌溉系统的改善,提高了土地的生产性,刺激了农业生产。这样由于工农业生产的恢复,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年均增长率上升到 15.1% 的高水平。与此同时,这个时期人口的再生产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大幅度上升,年均出生率达到 40.13‰,人口年均增长率显示了 0.8% 的水平,总人口的净增加超过了 5000 万人。

1966 年至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遭到巨大的挫折和损失,经济建设的正常秩序被破坏。1966 年进入了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由